

基于唯物史观的经济思想 现代化谜题重探*

李 卫

摘 要：“为何在古代取得光辉成就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未能先于西方实现现代化而陷于落后”是长期困扰中国学者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唯物史观，通过对客观社会存在与经济思想的解构，探究这一经济思想的现代化问题，为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发展提供启示。文章着眼 16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综合考察以中英学者经济思想结构演进特点为表征的主观因素和以两国国情变迁为表征的客观社会存在因素，在比较中分析社会存在的变化对经济思想演进的影响，构建经济思想演进的系统论框架。研究发现，同时期的经济思想演进与国情因素变迁共同构成经济思想的演进系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演进是国家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学家主观意识上的投射，这种经济学家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存在在经济学上的统一正可对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作以系统回应。

关键词：经济思想现代化 中英比较 经济思想特点 唯物史观

一、引言与综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提出，“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2016；2021：13），对构建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给予高度重视，强调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建设要扎根本土。事实上，只有用中国理论和话语才能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何以成

[作者简介] 李卫，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200020，电子信箱：liwei2020@sass.org.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系研究”（批准号：22CJL002）阶段性成果。

功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周文, 2021)。中华文化基因的理论化正是辨识“中国特色”的坐标之一(杨春学, 2016), 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文化基础(黄少安, 2000)。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也是现代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胡寄窗, 1981; 谈敏, 1990; 严清华, 1991), 它孕育了中国经济学的探索意识(程霖、张申、陈旭东, 2020)。因此要实现中华文化基因的理论化, “为何在古代取得光辉成就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未能先于西方实现现代化而陷于落后”是当代经济学人不能回避的问题。希望本文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回应, 有助于增强“四个自信”, 并揭示经济思想演化的一般规律, 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有所助益。

这一问题作为现代化问题在经济学领域的映射, 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近代即引起学者的重视。梁启超(2001: 4)认为, “西士讲富国学”, “虽曰新学, 抑亦古谊也”。他指出《管子》等书“与西士所论, 有若合符”, 感叹“前哲精意, 千年湮没, 致可悼也”。这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绝”的观点一度占据主流。改革开放后, 胡寄窗再次论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经济思想相比拟, 而在现代经济科学兴起后, 几乎停滞的中国经济思想很快被西方经济科学远远地甩在后面(Hu, 2009: 553), 其后学者亦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石世奇, 2005; 钟祥财, 2006), 又有学者称其为“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熊金武, 2015)或“中西方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分流”(张申、张亚光, 2017)。由于“李约瑟之谜”事实上包含了两重内涵, 将其作为这一经济思想发展问题的名称难免存在歧义; 而“第二次大分流”可以表明中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分化的状态, 却不能明确表达出分化发生在经济思想的哪些方面(如内容、方法或形式等)。鉴于这一时期英国实现了经济思想的现代化, 诞生了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现代化范式, 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近于停滞, 未能发生相似的变革, 且这一时期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将经济思想的发展置于整体现代化进程之内考察更为适宜, 因此本文将其重述为“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

总体来看, 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 国内学者虽承认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普遍认为其中某些因素起到最关键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经济结构是最重要的原因, 指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李大钊, 1920), 内卷化的明清农业使经济发展停滞(黄宗智, 1993), 而

中国地理环境优越，天然适宜农业（唐君毅，2016：24—53）。传统经济思想与农业经济相适应，若无巨大的经济变革难有改变，且不具备现代经济科学的货币经济基础。部分学者认为官僚政治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王亚南，1948），八股取士、学而优则仕以及文字狱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人才浪费和科学无法进步的重要原因（林毅夫，2007），专制统治者筛选修理过的“重义轻利、重农轻商、崇俭黜奢”成为人们经济行为的思想桎梏（钟祥财，2006：57），且明清思想家仍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不可能产生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叶世昌，2005）。部分学者则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反思，提出“在宗法阶段的社会便只有宗法社会的思想”（陈立，1944），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经济伦理不分，经济思想受制于经济伦理（胡寄窗，1986），“汉后儒者以言利为讳，经济思想遂少系统的发展”（马寅初，1936：2），特别是西方“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对个人价值的推崇与经济制度上对私人产权的保护相互支撑（陈独秀，1987：82—83），东方强调以义统利，“于欲望既须加以严正的择别，于一定的限度内认为必要的欲望，可以使之满足，此外则必须加以节制，而于满足欲望的手段，亦须守正当的轨范”（李大钊，1984：278），“僵化为固定的教条，变成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谈敏，2008：1）。还有学者强调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存在短板，重技术思维而轻科学思维（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2002：326—394），以感性为主、轻视纯理性分析与研究（唐任伍，1999），以及重直觉而非逻辑的思维方式、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思维习惯导致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困难（王捷，2007），但也有学者反对这种对文化的简单归因（杜恂诚，2011）。

虽然前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总体来看也呈现以下三点不足。第一，在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要综合考察制度安排、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叶坦，1999），单一因素视角虽可提供有益思考，但对于多因素交错作用的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的整体性分析。第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跨度长达两千余年，其间社会环境因素发生了诸多变化，以笼统的传统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会导致对不同阶段经济思想演进中的社会环境影响的作用机制无法进行深入分析。第三，仅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无法为分析提供参照系，而中外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对深入理解我国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刘含若，1980）。

鉴于此,本文基于唯物史观,考察现代经济学产生的重要时期(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①以中英两国经济思想演进特征为比较对象,^②拆解这一经济思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复杂影响:将作为主观意识的经济思想解构为以范式为外在表现和以研究本位、研究目标、研究重点构成的内在结构,以范式革命作为两国经济思想现代化分化的标志;将社会存在的变化解构为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四方面变迁,在比较中分析社会存在作为客观原因对经济思想这一主观意识的影响,以及作为主观意识的经济思想内部结构间的相互影响,实现经济思想发展中主客观因素的统一。由此,本文试图阐明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中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存在的统一,构建经济思想演进的系统论框架,揭示经济思想演化的一般规律。

二、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的范式表述

与经济史上的大分流同步,16世纪起英国由“道德哲学时代”进入“政治经济时代”,碎片化的经济思想逐渐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至18世纪现代经济学诞生,19世纪中叶实现第一次理论大综合,而同时期拥有丰富经济思想的中国却未发生类似演化。以科学哲学视角来看,这一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意味着两国经济思想出现了科学与前科学之间的分化,这种标志性分化体现为两国经济思想在研究形式与方法上的分化。由此,这一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可重新表述为:为何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思想实现了“范式革

① 本文的比较时段大体为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为保证研究时段思想的连续性与代表性,因而在时段上略有差异:中国的大体时段为15世纪后期至鸦片战争前,而英国的大体时段为15世纪晚期都铎王朝建立至19世纪60年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同时,虽然不能以个别学者或单一学派完全代表这一时期的整个思潮,但在长时段比较中关注两国主流经济思想的演进能较好地呈现两国经济思想的演进特征与脉络。

② 为确保研究的严谨性,本文须对中英两国的可比性作以说明。虽然在国土、人口和内部多样性上,中国更接近于整个欧洲,但因比较涉及思想、文化与制度等诸多因素,显然以国家为单位较为适宜。同时,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内:首先,中英两国都经历了16世纪的繁荣,17世纪的动荡,在18、19世纪进一步发展;其次,两国文明都是连续的,不曾因外部介入而发生突变与中断;最后,两国均为区域性强国,在各自所处的地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制度、科技、文化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如此使得对两国的比较可以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命”，在形式与方法上实现了现代化，形成古典经济学范式，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处于前科学范式状态（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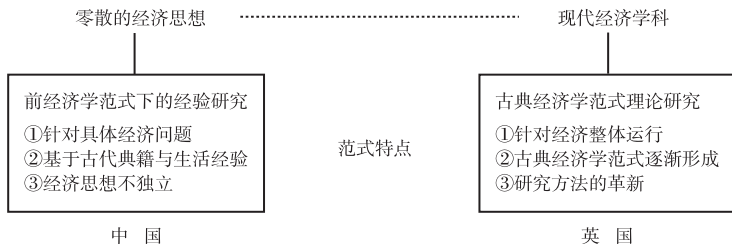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的范式表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具体而言，16—17世纪，处于前科学时代的英国重商主义与明清经济思想虽在研究主题上存在不同（马涛、李卫，2019），但在研究的形式与方法上仍有诸多相近之处。首先，虽然两国思想家的关注重点不同，但均只关注部分经济领域：中国思想家主要关注分配领域，而同时期英国思想家则关注流通领域。其次，两国经济思想都呈现碎片化特征，未上升为系统的经济理论，也未与其他学科思想分离，思想家的著述多是不成体系的政策建议集合：中国经济思想多零星散落在思想家的著作、奏章或书信中，而英国经济思想则多出现在各类针对经济问题的论战小册子中。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两国思想家多以直观经验为主，采用描述或归纳的方法。两国经济思想虽有内容上的差异，但都没有在范式竞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两者均无“科学共同体”和“专业基质”的范式界定，因而称不上是科学（赵晓雷，2005），没有任何征兆表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将趋于停滞落后，也没有任何征兆表明英国经济思想会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

至18、19世纪，明清经济思想仍延续着前科学的范式，呈现基于经验的应用研究倾向，目的在于纠偏，突出表现为以问题为导向、以政策建议为落脚点，且论证依据并非逐渐成熟的理论体系，而是古代经典与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未将改革实践经验提炼成理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清思想家的经济思考大多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规律并不深究。如实行海禁时，沿海地区的官员与学者大多呼吁开放，并分析海禁的弊端，而一旦海禁取消，讨论随即停止，并未延伸至对贸易的深入研究。

对于皇室的奢靡，丘濬建议公私分离，张居正劝谏皇帝节俭，李雯、宋应星抨击皇室浪费，林希元、林润、陆楫等主张裁减宗室禄米；而清代改行内务府制度后，宗室开支缩减，这些问题遂不再受思想家关注。明末清初，思想家对货币用银的抨击与银荒问题密切相关，清中期银荒问题得到缓解，货币问题遂无人问津。而那些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则一直受到思想家的关注，以田制问题最为典型，明中期海瑞、张居正等即从不同角度尝试解决，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李学派等对此同样关注，直到清中期仍有思想家论述。这种以问题为导向，以政策建议为落脚点的思考与讨论，具有明显的应用研究性质。

第二，明清思想家的应用研究并非基于理论研究，而是依托古代典籍与生活经验，缺乏理论创新。对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问题，思想家多表现托古改制的倾向。丘濬的公私分离与预算管理建议均源于对汉制与《周礼》的仿效。林希元对“往哲成规，昔贤遗论”，“斟酌损益，或已行而有效，或欲行而未得，或得行而未及，谓可施于今日者”。^① 针对田制，海瑞感叹井田衰落，顾炎武称赞井田，黄宗羲建议授田，颜李学派提出置田制，至19世纪前期吴铤的均田制建议，其思路都是变相的井田或授田。又如王夫之认为以田定赋存在弊端，主张以人定赋，顾炎武（1998：2）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这种明显逆历史趋势的建议也恰恰反映出托古改制的特点。对于新的经济现象，思想家多依自身经验分析：顾炎武依游历关中的经历直指白银为“害金”；唐甄从自身生活经历指出农民负担沉重，而商业更易致富；东南沿海官员对海禁弊端的分析主要依据对民间的走访与调查。这一时期的重大制度改革也多基于地方行政实践，从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源于地方平均税负、简化税收程序的实践；“火耗归公”将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正规化，在不损害百姓利益的情况下满足政府职能需要，减轻官员腐败。但遗憾的是，这些改革多为政府内部讨论，相关内容也未能理论化。

第三，在中国思想家看来，经济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依存，都是治国要务，因而经济思想并不独立于其他思想。经济思想多散见于各类囊括天文地理、道德法律在内的微型“百科全书”中：丘濬的《大学衍义

^① 林希元：《林次崖文集》卷1《荒政丛言疏》，清乾隆十八年陈肱声诒燕堂刻本。

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为总题，共分12目，其中主要是“制国用”“固邦本”两目阐述财政经济问题；林希元的《林次崖文集》卷二《王政附言疏》中仅半数篇幅涉及重农与财政问题；李雯《蓼斋集》中有“策”四卷半，共31篇，关于经济的仅“赋役”“财用”等5篇；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田制”包括土地制度和赋税，“财计”包括货币和重本抑末，各有3篇关于经济的文章。此外，官员们的经济思想常见于奏章或施政措施中，其分析与建议也不限于经济层面，经济思想仅作为其治国方略的一部分。而这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一大弊端在于，大多问题都能以经验有效地加以解决，学者们便失去了进一步探究学理的动机。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英国经济思想的演进则实现了“前科学范式→常规科学”的演进，方向则逐渐偏重于理论研究，以探寻经济规律为导向，力求构建理性框架。新理论不仅源于对前人的修正，也源于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学术研究逐渐独立化和专业化，古典经济学范式逐渐形成。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英国思想家对经济问题的探究逐渐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经济整体运行，理论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形成学科共识。重商主义者以政策建议为落脚点，仅涉及贸易差额论与简单的赋税论，未能建立起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在认识到“货币并不是一个商业方面的问题，而只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一种工具”（休谟，1984a：29）后，思想家的研究由流通领域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运行。17世纪末，研究侧重逐渐转向理论，经济思想开始出现在独立论著中。1776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确立了自主的、系统的研究领域。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建立了系统的经济学体系：《国富论》第1篇从分工出发论及价值的形成、价格与市场，进而延伸出分配理论，涉及了全部的经济主体——工人、资本家与地主；第2篇研究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涵盖了经济运行的生产、分配与交换；第3篇和第4篇分别讨论了欧洲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第5篇探讨了财政问题。此后，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原理》（1798年）、《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1820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

年), 约翰·穆勒^①的《经济学上若干未决问题》(1844年)、《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48年)等一系列著作纷纷出版, 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细化, 专业化程度也大大加强, 成为一门拥有完整框架的独立学科。

第二, 古典经济学范式逐渐形成。^② 在16世纪, 经济思想尚被认为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 而到18世纪经济学无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基于《国富论》的框架, 经济学的第一个现代范式逐渐形成。《国富论》出版后即得到学者的共同认可, 以至于议会辩论中引用《国富论》即可平息争论。赞同自由、非规制的市场以及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成为古典经济思想的首要特征。虽然斯密集中研究经济增长, 李嘉图对资本主义中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化感兴趣, 并在研究中修正斯密的理论, 约翰·穆勒则是进一步综合前人理论意图缓解社会矛盾, 但他们的研究均是对斯密经济学框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学者们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 他们确信经济自由提供了一种使经济体能够得到最有效运行的手段, 他们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概念, 研究作为市场资源配置手段的价格机制。在古典范式既有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原则下, 理论能够在分析工具的帮助下, 相对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范式体系经过不断的完善, 形成了知识形态的一个稳定发展期。

第三, 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确立也表现在研究方法的革新上。重商主义者主要采取经验观察法, 发现的往往只是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而古典经济学家发展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 从理性角度出发提出假说, 以逻辑推理对经济现象加以分析, 并以事实结果进行检验, 这种符合实验科学观念的新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新知识的生产。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双重的, 即揭示本质和描述事实, 因而他不仅继承了归纳法和演绎法, 还发展了现象描述的方法。《国富论》的前两篇偏重于理性演绎分析, 后面各篇则偏重于经验事实的归纳和说明。斯密仿效牛顿力学, 把世界看作具有因果关系的机械体系, 把社会经济现象视为一个通过自由竞争即可趋于平衡的因果关系链。同时,

① 本文简称约翰·穆勒时, 特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以和詹姆斯·穆勒相区别。

② 科学是由一定的“科学共同体”, 按照一套共有“范式”所进行的专业活动。所谓“范式”, 系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人们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思想交流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库恩, 2003: 158)。

他也采用经验观察法，以西欧经济史直观地证明中世纪缺乏自由的封建统治是如何阻碍农业的发展的，城市的兴起与产业的进步是如何依靠良好的政府、秩序以及保障个人自由安全的制度等的。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理性抽象方法，运用模型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研究，虽然被抨击为“李嘉图恶习”，但模型化确实为增进对经济事物的理解提供了洞见。马尔萨斯与穆勒父子等人则更强调对经济现象间表面联系的描述，对经验观察法的系统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综上，经过几百年的演进，两国经济思想终于呈现截然不同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不可通约性”，也由此给后人留下了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

三、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的直接原因探析

经济思想的演化根植于具体的经济社会现实，同时也受到经济思想家主观意识的影响，因而本文首先考察直接原因，分别结合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依次探析该时期中英经济思想走向殊途的原因与作用机制。本文发现：客观上中国的科学进步缓慢，而主观上中国经济思想家重点研究国内资源的分配，也未能将研究扩展至经济的整体运行；而科技革命使得英国科学水平突飞猛进，且英国思想家的研究重点为价值和财富的源泉。两国学者研究重点的差异与基础科学的发展差距使得两国最终在范式演进中呈现不同的结果（见图2）。

（一）中英科学发展变迁比较

对科学的探索首先源于对世界的认识与对知识的态度。在传统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其中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和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相互影响，“道”既超越又内在于人，人先天具有某种与“道”沟通的禀赋。^①天体运行、四季递换、人间伦理、政府组织，以至人的身心都是一个个严整的系统，层层套叠，彼此相关，万物都遵循周而复始的

^① 虽然不同思想流派“沟通”的方式和内容有所不同，但天人关系的结构是共享的。无论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司马迁提出的“天人之际”说，刘禹锡、柳宗元提出的“天人相交”说，还是程颢提出的“天人同体”说，张载提出的“天人合一”说，朱熹提出的“天人一理”说，陆九渊、王守仁提出的“天人一心”说，王夫之提出的“天人一气”说，都把天人关系看作是自己思想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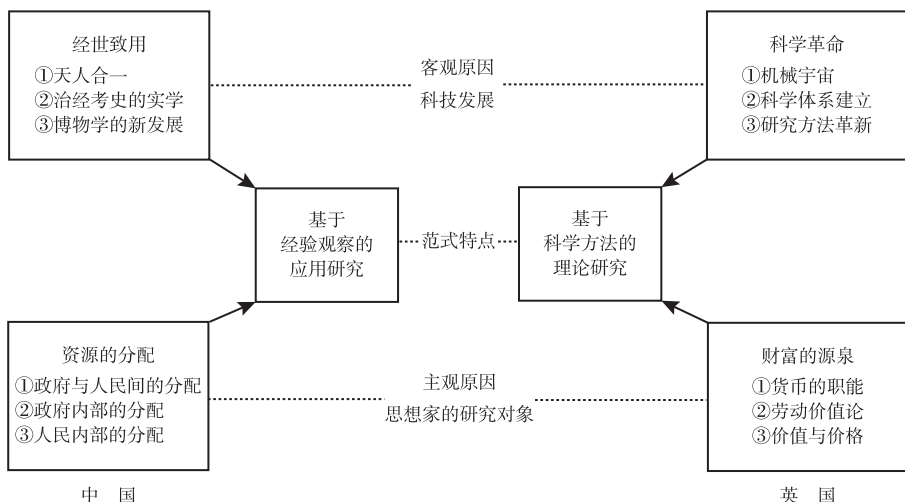


图2 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的直接原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循环，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诞生、发展、消亡都在循环中进行，终点也是最初的起点，事物的因果也可以相互转化。在这井然有序的系统中，一切都是可预知的，一切离开常态的变化也可经过适当的安排回归正常。由此，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而非彼此独立的学科。在这个可预知的循环世界里，探索知识不仅是为了博古通今，更为求“经世之用”“明道”“救世”（顾炎武，1983：70），并由此产生两大学术方向。一是实学，治经考史，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取真知，从经典中寻找救世的思想资源。以现代视角来看，实学属于社会科学范畴。明中叶到清乾嘉时期是实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开创的重实践、重验证、重实测的新风之下，中国思想家以考据为手段阐述经世思想，从“实用”的立场对理学加以改造。明朝以“经世”为题的21部文编大多是在晚明，《皇明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及《皇明经世文编》等皆以“参订往哲”“裨于实用”为旨归。顾炎武笃志于经学，黄宗羲专攻史学，颜李学派倡导经济之学，思想家们期许掌握古今知识，代圣人立言、为天下规划。随着政局稳定，实学向考据学演化，至清乾嘉时期成为学术主流，思想家重证求实，还原经书本旨，字字探求本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1999：173、191），“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梁启超，2015：19），形成了独特的学术宗旨

和治学方法。但思想家们对古人思想的过分迷恋，却走上了另一条歧路，他们以为严守经义才是正统，最终仅在方法论上对经学精神作了总结与提升（夏锦乾，1998）。二是博物学，^①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探索、吸纳并推广新技术与新知识。中国思想家对自然的探索注重对事物进行描述、命名与分类，掌握事物间的联系，运用与推广实用知识。这些研究包罗万象，既有中国传统的方志，也有欧洲输入的近代科学；既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律，也包括地理、农业、水利及各种技艺等。传统天文学的目标并非探究天体运行原理，而是记录“天象”并解读其中寓意，供治国者参考。传统数学同样服务于行政管理，偏重于土地测量、粮储计数、土木工程等应用。传统医学方面，《本草纲目》收药 1892 种，分水、火、土、金石等 16 个门类，侧重于药材性质，并未腾跃为以病理学和逻辑思维为基础的现代医学。此外还有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以及《天工开物》等实用工艺技术的大型丛书。思想家对外来技术的心态颇为开放，徐光启（1963：82）主张“广其术而以之治水治田之为利巨、为务急也，故先之”；宋应星（2002：205、246、350）虽排斥西方宗教，但是却引入西方焊铁、铸造枪炮等知识。遗憾的是，这些知识多寄望于以实用技术服务治国，终究只停留在了应用层面。

在中国传统学术日臻完善却未有革新的同时，世界彼端的英国逐渐走上了科学革命的道路，不仅推动了物质生活的飞跃，也带来了思想的伟大进步。科学革命始于人们世界观的改变。16 世纪的天文学大发现打破了以地心说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世界观，接受日心说也意味着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体系，学者力图证明“天上的机械不是一种神圣的、有生命的东西，而是一种像钟表那样的机械……几乎所有的多重运动都是由一个最简单的、磁力的和物质的动力造成的”（Holton，1983：67—68）。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崭新的基础上搭建科学和哲学的大厦，提出思想和物质构成了世界，植物和动物都是繁复缜密的机器，科学家可以借助机械原理对其进行解释。1687

^①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并不称这种学问为博物学，现代意义上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来自西方，与西方近代科学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相对应，是两个学术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一是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传统，二是观察、记录和描述自然的传统。两者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史”“志”风格具有相似性（吴国盛，2016：190—199）。

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将科学的新发展汇集在一起。在新的世界观中，上帝被认为是一位钟表匠，设计并构建了宇宙，但宇宙的运转不需要神的持续介入，不同零件之间彼此的相互作用力是运动的原因，就像精致的钟表嘀嗒走动。18世纪后的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走上了牛顿所指引的道路。以新世界观为核心，科学体系开始构建。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牛顿等都是其中的知名成员。新知识的增长目不暇接，理性精神再度复兴，不同的学科被划分出来以研究、解释特定领域的现象，每个领域有它自己的符号元素和规则。学者接受专门化训练，有自己的专业共同体，可以进行清晰而专注的思考与更加高效的学术交流。

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引发人们思考：“既然世界运行并非上帝的意志，那么社会何以产生并运转？”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到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理性为核心的“社会契约论”为建立自主和自由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力依据；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人性论》中表述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用同情理论建立了道德世界的和谐秩序，但他不满足于脱离人类经济本性的解释，并逐渐走向经济学。各领域的学者都在努力争做本行业的“牛顿”，他们都希望融通本专业的定律，就像牛顿以万有引力解释宇宙运行一样。学者们大多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第六卷《精神科学的逻辑》中提出，只有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道德的现象，才能补救道德科学的落后缺点，而其中最能应用于道德科学的是物理学方法。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研究方法的革新。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已难以促进科学的进步，基于经验观察的方法同样如此。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和对科学程序进行逻辑组织的先行者，主张用实证和归纳来发现真理，观察报告和归纳越详细，预见能力就越强，进而概括出自然运转的法则，辅以反复实验观察，确保结论准确。不列颠经验主义强调感觉与反思，主张归纳法，但也具有理性主义的显著特色。霍布斯在某些方面属于经验主义，但他也肯定演绎法在科学探索中的作用。洛克深受实验科学及笛卡尔哲学的影响，他在知识观上把理性放在第一位，在政治理论中又包含了理性与经验主义的混合。之后的学者逐渐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休谟主张用归纳和演绎揭示现象间的内在

联系，将论证建立在大量的一般性假设之上，但同时他又是怀疑论者，认为人的思维只能达到有限的现象世界，主张用现象描述来代替“永远达不到的真理”。休谟的哲学方法论对斯密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演绎和归纳法与经验观察的交替使用在《国富论》中也有诸多体现。最终，约翰·穆勒在《逻辑体系》中总结了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归纳”的方法，即“观察—抽象归纳—回归实际”。

（二）中英经济思想家的研究对象比较

明清中国思想家们侧重经济管理，主要研究对象为经济资源（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其一，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分配上体现为减轻农民与商人的赋税负担。减轻农民赋税历来受思想家重视，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认为历代税制改革均属于并税式改革，旧税未减而徒增新税，致使百姓负担日益加重；顾炎武则指出减轻田赋的政策只对地主有利，减低私租才能使农民真正受益。明清时期，“工商亦本业”“农商相资”被广为接受，张居正精辟指出：“商通有无，农力本穡。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穡以资商则商病。”^①许多官员都要求减轻商税以宽商民，萧彦指出，“商困则物腾贵而民困矣”；^②王守仁（2015：688）也提出，“商人比诸农夫固为逐末，然其终岁弃离家室，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良亦可悯”，呼吁商税遵照“事例抽收，不许多取毫厘”。以东林学派为代表的民间思想家还投入为保护工商业者利益而斗争的行列中。清中期，吴铤主张轻征商税，因为商人会将税负转嫁给百姓，致使“百物腾贵，黎民重困”。^③汤鹏则提出，“民不厌于供，则少取之而生多取焉。物不穷于出，则少用之而生多用焉。如是者国无贫”。^④其二，资源在政权内的分配则涉及政府与皇室间的分配，以及政府内部的分配。丘濬建议仿汉制将财政收入分贮内、外二府，限制皇

① 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

② 萧彦：《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载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407《萧司农奏疏》，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③ 吴铤：《前因时论十八税敛》，载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5《户政二十七榷酤》，武进盛氏思补楼刊本。

④ 汤鹏：《浮邱子》卷10《医贫》，清同治四年李桓刻本。

室开支。张居正以养生之道向皇帝劝谏保民之理。皇室浪费也同样引起民间思想家关注，宋应星（1988：186）逐项抨击了宫廷开支的巨额浪费。对于政府内部的分配，官员们强调整节用与加强财政监督。丘濬认为，“理国之财”关键在节用，“不耗其财于无益之事，不费其财于无用之地，不施其财于无功之人”，^①应仿行《礼记·王制》中的预算制度，“每岁户部先移文内外各司及边方所在，预先会计嗣岁一年用度之数……造为帐籍，一一开报。又预行各处布政司并直隶府分，每岁于冬十月百谷收成之后，总计一岁夏秋二税之数……至十二月终旬，本部通具内外新旧储积之数，约会执政大臣通行计算嗣岁一年之间所用几何，所存几何，用之之余，尚有几年之蓄，具其总数，以达上知。不足则取之何所以补救，有余则储之何所以待用。岁或不足，何事可以减省，某事可以暂已”。^②同时，他建议将洪武到弘治年间的财政收支状况汇编成会计录，作为制订预算的参考。张居正力主约束官员的奢侈浪费，“财赋不窘于国用之繁，而亏于士大夫之侈纵”，^③并将之列入“考成法”着力监督。其三，对于民间的资源分配，思想家主要关注土地在地主与农民间的分配，以抑兼并为目的，以整顿田制为手段。顾炎武对北魏均田制大为赞扬，称其“创百世之规”，也赞许对其采取变形、改革的“知言之士”，^④并指出均赋的前提在于均丈。^⑤黄宗羲认为土地私有神圣不可侵犯，政府既不能触动富人的私田，又要对普通百姓授田，因而设计了利用官田推行井田的方案。颜李学派同样希望兼顾地主与农民的利益，王源提出置田制，实际上是变相的井田，其进步之处也在于希望以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恢复井田，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下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对分配问题的关注，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因此中国思想家的关注点更集中于问题的具体解决，再加上经世致用的崇古与对应用技术的追求，使他们更容易忽视问题背后的本质与规律。

而同时期的英国思想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财富的源泉，即价值的创

①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1《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0《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29《答总宪李渐庵言人臣节俭之义》，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

④ 顾炎武：《日知录》卷10《后魏田制》，清乾隆刻本。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10《治地》，清乾隆刻本。

造与实现。重商主义者对于价值的认识是围绕货币的，事实上关注的是价值的实现。洛克认识到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并指出货币的价值不取决于自身价值而取决于其数量，已隐含转向劳动价值论的思考（Hutchison, 1988: 68—70）。转型时期，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于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奠定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基础（Petty, 1662: 49）。他认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自然价值的高低取决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劳动人手的多少。以此为基础，配第进一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他第一次提出了剩余这一概念，指出地租就是一种剩余，并触及了劳动价值的等价问题（Petty, 1662: 24—27）。在配第看来，货币和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劳动产物，这是它们共同的价值基础，因此货币才成为一切商品的等价物。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D. Stuart）^①同样系统地研究了价值问题，提出“实际价值”的概念，并试图把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触及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他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提出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需求和竞争的复杂作用决定的，商品的价格包含“实际价值”和“让渡利润”。正是由于劳动价值论形成并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同，古典经济学范式才得以确立。《国富论》前四篇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国民收入的构成与各时代各国家每年所消费资源的性质。斯密首先借助“钻石与水”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出了著名的“价值悖论”。他发展了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生产一切商品的劳动都能直接创造价值，同时商品与货币、商品交换都有交换价值，价格只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一种形态。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具有二重性，由此形成两种价值论：一种是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另一种是交换中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斯密进一步指出，劳动决定价值的规律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有了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资本家出卖商品所换回的劳动量，除了工人工资（劳动者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外，还包含利润和地租，这三种收入共同构成和决定商品的价值。斯密分析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认为自然价格相当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即价值，随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的变动而变

① 学界多译为詹姆斯·斯图亚特。

动，而市场价格是商品售出的价格，两者不相符的情况是由于商品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市场价格是以自然价格为基础的，由商品的供求关系来支配，由竞争来调整，这种背离对于生产有自发的调节作用，供求最终使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趋于一致。劳动价值理论同样是李嘉图学说的基础和出发点，他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耗费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坚持商品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量，并运用这一原理来考察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范畴和规律。约翰·穆勒对于古典经济学的大综合也依旧继承了这一分析框架。对财富源泉的探究不是现实问题，而是理论问题，由此造成了英国思想家对理论研究的侧重，加之科学进步带来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革新，直接带来了经济学范式的现代化。

四、中英思想家研究重点差异的原因探析

作为主观意识，中英两国思想家的研究重点事实上也受到更深层次原因的影响，其直接原因同样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分别分析。客观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基本稳定，并不需要对经济运行的整体情况进行研究，且主观上中国思想家的经济研究目标主要在于维护国内秩序的稳定，因而更加重视资源的分配；而同时期英国的经济结构处于持续的变革之中，且英国思想家以财富增殖为主要目标，因而学者需要在变化的现象中探寻价值的源泉。在主客观因素的双重作用下，两国经济思想家的重点研究对象出现分化（见图3）。

（一）中英经济结构变迁比较

明清中国在产业结构方面仍处于原始工业化阶段，农业及相关行业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八成以上，但农具制造和生产技术都有新的发展，玉米、番薯、洋芋、花生等作物的引入使过去无法种植稻、麦的山地、丘陵与河地都能投入生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激增，由明初（公元1400年）的7500万人口增长到明末（公元1600年左右）的1.9亿，公元1800年增至3.4亿，公元1850年左右达到4.34亿（葛剑雄，2002：147）。由于疆域广阔，农民离开发达的人口密集区，到国家西部和北部开垦新的田地，新增的人口再度被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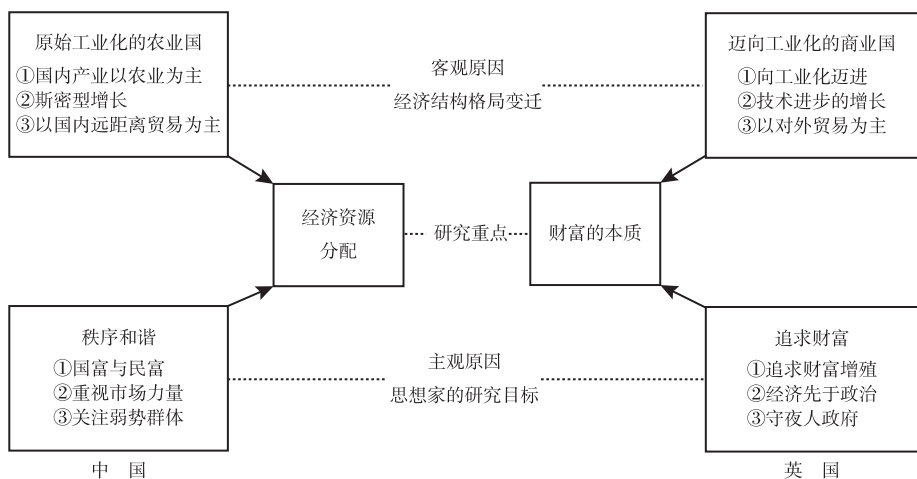


图3 中英思想家研究对象差异的原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吸纳。此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已接近前工业社会的极限，“天地生财，止有此数”^①几乎已是时人的共识，有限的增长来自国内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即“斯密型动力”（李伯重，2001）。在市场结构方面，16世纪区域经济专门化已鲜明显露，各种商业集镇纷纷兴起，国内水运网的发达也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繁荣，长距离交易渐成规模。稻米主产区已转至长江中游，长江下游转向商业与手工业，广东、陕西的冶铁业和云南的矿业迅速发展，河南的棉花、松江的棉布、江宁的丝绸、佛山的铁器、两淮的海盐、景德镇的瓷器、闽浙的茶叶、台湾的糖等特产行销全国，关东通过海运与上海进行大豆和布、茶的交易，山西票号也随着商业的繁荣迅速发展。同一时期的对外贸易有面向东南亚、日本的交易，有与欧洲商业公司横渡印度洋和太平洋所进行的贸易。虽然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美洲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但外贸体量远小于庞大的国内市场，19世纪出口茶叶只占茶叶产量的13%—14%。^②同时，即使海关关税远高于内地商税，18世纪末每年65万两的海关税收仍远小于400万两的国内商业税，且外贸难于监管，因此中央政府并不重视。既然人口激增没有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中国思想家的研究重点自然会转向经济

① 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43《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

② 这一估计以吴承明（1983）计算的茶叶贸易数字为依据。

资源的分配。

同时期的英国产业结构逐步向工业化迈进。15世纪后期人口激增和“价格革命”引发了圈地，农场制兴起，农业开始转向资本主义生产，土地使用效率得到大幅提高，同一块耕地在圈地后产量增加了13%（Wordie, 1983），同时大量失地农民向城镇迁移。16世纪20年代，英国每年的迁移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5%，17世纪上升到30%以上（Beier, 1983: 8—9），城市工商业发展大大加速。17世纪下半叶农业机械化开始，1700—1760年农业产出每十年的增长率约6%，1760—1800年约5%，1800—1831年则达到12%（Mathias and Davis, 1989: 111）。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兴起，工厂制出现，蒸汽机的逐步推广进一步使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到1850年，农业占英国经济总量的比例下降到21%，工业和建筑业所占比例上升到35%，运输业所占比例上升到19%（Mitchell, 1988: 800）；1600年超过75%的英国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到1720年下降至50%，1801年进一步下降至36%（Needham and Needham, 1954: 253—258），英国已完成从原始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型。同时，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760年的9000万英镑增加到1860年的6.5亿英镑，增长了6.2倍（王章辉, 2013: 169）。在市场结构方面，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英国的国内商业网围绕伦敦逐步形成，伦敦的粮食和生活用品要靠全国各地供应，同时它也向全国供应进口商品。对外贸易在英国近代经济发展与变革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争取有利贸易区和贸易线路，海外扩张成为国家的冒险事业。通过商业扩张和海上掠夺，国内财富大大增加。1600—1688年英国每年增加的资本额近200万英镑，均来自对外贸易（达维南特, 1995: 160）。18世纪，英国政府继续推行重商主义，出口贸易的增长更是快于工业增长的速度，工业生产增长近3倍，国内消费大约增长2倍，而出口却增长了5倍以上（Cole, 1981: 39—40）。18世纪初，转口贸易占外贸总出口额的32.4%，到18世纪末这一比例上升到39.2%。有学者统计，18世纪英国转口贸易额在1700年为109.6万英镑，1720年为230万英镑，1740年为308.6万英镑，1760年为371.4万英镑，1780年为456.4万英镑，1800年为1884.8万英镑（Mitchell and Deane, 1962: 279—281）。182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18%，1850年上升到21%（宫崎犀一、奥村茂次、森田桐郎, 1990: 21），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国。持续增长的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充分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经济结构的转型也需要学者从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中探寻财富的源泉，即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二）中英思想家的研究目标比较

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家们，在研究目标上追求秩序和谐，主张以政府力量理顺经济关系，重视公平；而英国的思想家们，在研究目标上关注个体的经济利益，将追求财富置于首要位置，重视效率。

明清思想家主要关注国内各不同群体，意图平衡各方利益，理顺经济关系，维护天下秩序。“为天下主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① 其一，协调政府与百姓的经济利益，“善于富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② “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③ 为了保证国家有充足税收，富民也愿意适当牺牲本群体利益以商税充实国家收入。王夫之重视商业发展，但也主张农、工、商都要承担赋税，“人各效其所能，物各取其所有，事各资于所备，圣人复起，不能易此理也”。^④ 王源建议改按商人资本的多寡征收商税，并设想出一种类似于近代所得税的商税制度。^⑤ 其二，在对待政府与市场的态度上，思想家也更加重视市场力量。在盐政方面，明嘉靖年间，陆深主张改征盐税以便“通商”，否定盐专卖存在的必要性。^⑥ 顾炎武赞同明末李雯提出的观点：“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⑦ 直到清中期这种呼声仍旧强烈。在矿政方面，万历年间民间即爆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清前期蔡毓荣上奏，“若令官开官采，所费不貲”，“莫若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之为便也”。^⑧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金鉉奏请“召募本地殷实商人，自备资本开采。所得矿砂以三归公，以七给商”。^⑨

①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5《制国用·市籴之令》，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0《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2《制国用·贡赋之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王夫之：《噩梦》，清光绪刻王船山先生四种本。

⑤ 王源：《财用第七（下）》，载李焯订：《平书订》卷11，清畿辅丛书本。

⑥ 陆深：《拟处置盐法事宜状》，载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155《陆文裕公文集》，明崇祯平堂露刻本。

⑦ 顾炎武：《日知录》卷10《行盐》，清乾隆刻本。

⑧ 蔡毓荣：《筹滇理财疏》，载贺长龄编：《清经世文编》卷26，清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⑨ 《清世宗实录》卷76，雍正六年十二月丙申，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1页。

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马尔泰和策楞建议官督商办,税后矿石由官府按现价收买。^①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谕旨承认:“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是亦藏富于民之一道。”^②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也反对常平制度中官方违背市场定价,吴应箕指出其后果:“则商贾负贩之流,必以无利罢业而货不流,货不流而民之需愈急,则物之价愈贵。是有司之禁高价者,适所以长价;而欲便民者,反以困民。”^③王夫之强调“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④批评那些不懂价格规律、动辄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的人是“俗吏”。^⑤统治者也已重视利用富商的社会作用,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西安米价腾贵,皇帝谕示“可招募身家殷实各省富商,给以正项钱粮,并照验文据,听其于各省地方,购买粮米运至西安发粜,所得利息听商人自取之”。^⑥其三,在协调民间经济关系上,“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⑦思想家普遍要求政府关注弱势群体,平均各群体赋税负担。对于力役,丘濬主张“配丁田法”: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反对摊逃。^⑧庞尚鹏、海瑞等在多地试行“一条鞭法”。^⑨张居正力主打击豪强的扰法行为,“约己敦素,杜绝贿门,痛惩贪墨,所以救贿政之弊”,同时“查刷宿弊,清理逋欠,严治侵渔揽纳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⑩此外,思想家还建议加强针对民间物价波动的常平措施,主张建立地方政府定期汇报粮食价格的制度,以便中央政府及时掌握各地粮价波动。但是,他们也普遍承认,“天生众民,有贫有富”,^⑪且兼并“积习已久……而弱者亦且安之矣”(王夫之,2011a:193),“非豪民之能钳束贫民而强夺之”(王夫之,2011b:277),因此反对夺富予贫。

① 《清高宗实录》卷220,乾隆九年七月上乙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4页。

② 《清宣宗实录》卷404,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乙巳,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页。

③ 吴应箕:《楼山堂集》卷12《江南平物价议》,清粤雅堂丛书本。

④ 王夫之:《黄书》,清船山遗书本。

⑤ 王夫之:《噩梦》,清光绪刻王船山先生四种本。

⑥ 《清圣祖实录》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乙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7页。

⑦ 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38《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

⑧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2《制国用·贡赋之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庞尚鹏:《题为厘宿弊以均赋役事》,载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357《庞中丞摘稿》,明崇祯平露堂刻本;万斯同:《明史》卷226《海瑞传》,清抄本。

⑩ 张居正:《张太岳先生文集》卷26《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明万历四十年唐国达刻本。

⑪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5《制国用·市籴之令》,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英国思想家们在研究目标上则将追求财富置于首要位置，表现出明显的效率优先，政治仅仅是获取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其一，重商主义者认为商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主张“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孟，2011：5），发展本国生产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础，应开发自然资源，发展民族工业等。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家们多站在土地所有者立场来讨论对财富的追求。配第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把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看作一国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出减少非生产性人口，增加在物质生产领域中就业的人数，并主张征人头税激励人们去工作。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国家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分工的水平和规模，二是科学和技术的发明。斯密将增长问题作为经济学主题突出出来，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即“富国裕民”（斯密，2014b：3），为此一要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二要增加生产工人人数。其二，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斯密直言：“英帝国的任何省份，如不能对全帝国的维持有所贡献，英国就该摆脱为防御那省份而支出的战费，摆脱任何维持那省份的平时民政或军事设施的费用，并努力使将来的企图与计划，适应它的实际情况。”（斯密，2014b：522）其三，随着对财富的追求，在对待政府与市场的态度上，英国思想家由主张政府干预转向主张有限政府。重商主义时期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商人们希望在国家的干预之下取得更大的利益。而转型时期思想家的观点已发生转变，配第（Petty，1662：11）详细探讨了国家的收支状况，认为军费是国家最大的经费开支，而行政司法费、宗教费、教育费及支付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相关费用等则应整顿裁减，因为这些经费对社会的贡献微不足道；另外，对于救济费、公共工程等提高人民基本生存权利的、与振兴生产力有关的经费开支则应增加。斯密首次提出“公平、确实、便利、最小征收费用”的赋税原则，主张降低税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18世纪，斯密指出除必须由国家来提供的职能外，政府不应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扩大财富是人的本能，人之所以能最大限度地生产财富，是因为人对自己利害关系的了解比别人更清楚。“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

分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斯密，2014b：258）。19世纪，约翰·穆勒进一步以“一般便利”为原则，对政府职能进行适当扩展，重新将政府职能划分为“必要的职能”和“选择的职能”，同样不主张政府职能的扩张（穆勒，1991：366—372）。

五、中英思想家研究目标差异的原因探析

中英两国思想家主观上的研究目标同样也受到了更深层次原因的影响：在客观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且中国思想家主观上的研究本位大多是政府本位，^①因而将秩序和谐即政局稳定置于较高优先级，在保障秩序的基础上允许私人经济的发展；而英国的国内外政治局势则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以个人本位为主的英国思想家因此将追求财富置于较高优先级，视政治为追求财富的必要手段（见图4）。

（一）中英政治局势变迁比较

在客观上，两国思想家研究目标的差异是两国不同政治格局变迁的具体体现。明清时期，就国际形势而言，中国外部环境大体稳定，在多数时期并没有国家可以形成对中国的实质威胁，维持庞大疆域的巨额成本也使得明清君主无意过分扩张。在国内政治上，虽然经历了改朝换代，但清政府对明代制度进行了大规模承袭。官僚制度的发展在帝国晚期已非常完备，这种精致的大一统集权制度使得国内各政治势力更容易达到平衡，相互制衡的局面充分维护了政局的稳定。在中央政府，皇帝更倾向于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而不是与人共享，对宦官与包衣的重用正是典型的表现，但

^① 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国家本位的（赵靖，2002：558；马涛、李卫，2019），但严格来说，古代中国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中国”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称谓，使用国家本位易产生歧义，且事实上思想家的视角多是从国家治理者的角度出发，因而本文将其修正为政府本位。此外，明清时期虽有大量关于商业经验类书籍出版的商书现象（张海英，2017），但这些书籍多为对经营活动的“专业”知识的指导，主要出自民间坊刻，并未对明清主流经济思想产生足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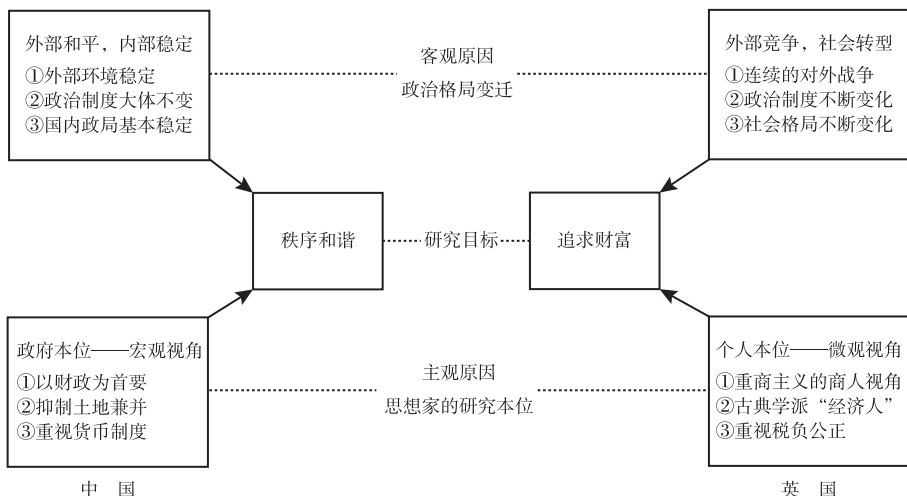


图4 中英思想家研究目标差异的原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权力的行使也会受到官僚集团的重大牵制。皇帝在与官僚集团的博弈中时常处于劣势，一方面是由于官僚集团逐渐形成的集体行动能力与舆论影响力，另一方面则在于信息的不完全，皇帝想要得知帝国治理的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在地方行政层面，因财力有限，加之人口激增使得治理难度大大高于前代，如无富民支持，^① 地方官员难以有效完成其职能，与富民共治虽有效实现了公共品供给，但削弱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富民阶层不仅包括有科举功名的退休官员，还包括富裕的地主和商人，他们彼此通婚、相互合作，在政府以及各社会等级间普遍存在相互渗透。借由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富民在当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有些甚至已具有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在利益受到威胁时，这些地缘性的社会力量即可能发挥牵制，甚至抵消政治权力的作用。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内，皇帝、官僚及富民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得多数时间国内政局基本稳定：皇帝和富民在约束官员的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当富民的地方影响力突出时皇帝与官僚会采取一致

① 林文勋等认为，明清社会并非“市民社会”，宋元明清四朝都具有“富民社会”的特点，都具有同质性，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阶段来看待，而“士绅社会”是“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其最后阶段（林文勋、张锦鹏，2019）。

的态度抑制其过度发展，而皇帝对富民的过分侵犯也会遭到官僚与富民的共同抵制。同时，这三大群体实际上都是制度的依附者和既得利益者，因而在这种稳定的平衡之下，没有一个群体有动力为追求不确定的财富而打破现状，稳定的局面显然要比追求财富更加重要。

与明清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相反，英国经历了急速的变革。16—19世纪，英国作为后起之秀加入到优势贸易路线的争抢中，与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家对财政收入有极大需求。在国内政治制度上，都铎时期，议会逐渐成为国王、大贵族与精英三方协商的平台，经过近120年的改进、补充和更新，议会工作程序、规章和议事机构趋于稳定，立法成为最高决策权的体现，掌握议会的控制权逐渐成为国内各阶级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光荣革命后，王政府逐渐向责任内阁过渡，政党政治也逐渐走向成熟，内阁与议会下院之间的有机联系建立（钱乘旦、许洁明，2002：194），不断发展的政治制度给了各阶级表达自身诉求的平台与机会。与此同时，英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的政治权力基于私人财富，只有富人支付得起各种官职的开销，出任官职也有明确的财产资格要求。15—16世纪，乡绅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1600年乡绅的总收入达到教、俗贵族和富裕约曼收入总和的3倍（Tawney，1978：110—111），他们在地方行政中担任治安法官，从国家公权力中获得声望、名誉和地位。随着商业发展，不少有产者转而经营商业，财富的增加使其社会地位随之提高。商人除亲自参加议会外，还通过非正规途径对议员施加影响，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游说团”，以贿赂的方式要求议员支持或反对某一提案。这一时期，精英们希望从外贸中获取更多财富，国王希望获得更多税收，这些都以夺取优质贸易路线为前提，强势的都铎君主制恰恰顺应了国民的需求。17世纪，政治均衡被打破，大贵族与精英的势力持续增长，形成了对王权的制衡，他们极力反对国王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国王与下院之间的冲突日渐激化。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确立，政治上的贵族寡头制与经济上的大地产制使贵族阶层成为英国这艘航船18世纪的主人。1710年议会制定相关法案，把拥有地产作为进入政治上层的必要条件。资料表明，1700年，英国贵族占有全国土地财富的15%—20%，到180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约为20%—25%（Potter，1982：80）。而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造就了新的财富即工业财富，其积累迅速超过了农业财富，产业资本家随之崛起。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土地所有者与以工业收入为主的产

业资本家的利益逐渐分化，甚至发生冲突。对财富的掌握和对舆论的影响使得产业资本家具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得以在 1832 年议会改革后与土地贵族分享政治权力。财富是重要的政治资本，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中所不变的是各利益集团对财富的追求。

（二）中英思想家的研究本位比较

“本位”是思想家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具有极强的主观性。明清思想家多持政府本位，从天下治理者（王朝政府）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问题，体现为对财政、土地、货币等宏观经济问题的关注。其一，作为天下治理者，中国政府的统治依赖庞大的官僚体系与军队，财政是政府的首要问题。明清时期，政府职能进一步明确为“立政养民”，国家赋役的合法性大大加强，无论官员还是民间思想家均以财政管理为第一要务。“民生于天而岁岁有生死，谷产于地而岁岁有丰凶。苟非有司岁岁各具其数以闻之于上，则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广远、闾阎之幽隐，曷由以知之哉？”^① “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② “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③ 具体的财政问题同样是关注重点。丘濬提出，仿《礼记·王制》编制简单的预算，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在预计盈余或赤字的基础上维持财政平衡，并以财政收支详细状况作为预算的参考。明后期赋役制度改革的实践与讨论在一条鞭法的推行中达到高潮，而清前中期的摊丁入地与火耗归公同样在政府内部产生了很多讨论。其二，明清税制以农业税为大宗，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下，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兼并对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损害极大。时人普遍认为土地兼并源于赋役不均，他们指出田制混乱是重要原因，并积极寻求对策：丘濬认识到井田已不可复，主张限田，并以配丁田法平均税负，反对摊逃；张居正主张打击豪强，以清丈和考课来消除弊端；顾炎武主张在均丈基础上推行均田，实行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黄宗羲与颜李学派都希望以经济手段恢复井田，在保障私有产权的前提下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王夫之则主张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重，通过减税降低农民负担，同

①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 20《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李贽：《李温陵集》卷 18《道古录》，明刻本。

③ 李贽：《四书评·大学》，明刻本。

时以法令配置土地，限制土地交易。其三，由于货币制度的稳定对税收的重要影响，许多思想家将其与财政问题联合讨论。针对明前期的钞法混乱，丘濬提出“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①提倡货币足值和以银为本位的钱钞兼行制度，并保证纸币与银钱的可兑换性。明中后期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货币化引起思想家关注，明末清初的银荒使其成为不少思想家抨击的弊政。顾炎武指出，“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而卖所无，故也”。^②但他是反对政府以征银为名聚敛财富，并非反对一般的货币缴纳形态，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也持相同意见，唐甄从商业角度论述，但同样赞成货币一般形态。

同一时期，英国思想家的出发点则是个人本位，重视个体利益，基于个体视角关注财富的本质、如何追求财富等问题。其一，重商主义者从商人视角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视货币（金银）为财富，主张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财富，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将货币保藏在英国而不外流，而晚期则主张以贸易逆差增加财富。对于财富的关注导致了人们对利息的关注。1691年，洛克出版《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认为利息像地租一般正当，货币数量影响利息率。这些讨论也延伸到货币问题，但与中国思想家不同，英国思想家更关注币值的稳定。17世纪末，英国产生了围绕硬币贬值的争论，以洛克为代表的一派即主张重铸足值货币。18世纪，休谟对洛克的利息理论加以抨击，提出原始的货币利息理论，即货币数量变动影响收入和资本品的价格，利息本质上是收入和资本品的一个比率，并指出“高利息出自三种环境”（休谟，1984b：42—43）。其二，古典经济学家同样以个人为研究出发点。斯密经济思想的基础是人类行为动机分析，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同情的道德原则”基础上，他认为利己心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人的本性，分工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斯密，2014a：11），个人在利己心驱使下自由进行的分工与交换行为恰恰实

① 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6《制国用·治国平天下之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11《以钱为赋》，清乾隆刻本。

现了社会的最优,《国富论》即由此开篇并逐步论及经济的增长与财富的源泉,构建起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而同情与自利是斯密认为的互补的人类行为基础。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李嘉图、约翰·穆勒等人大体上维持了斯密建立的分析框架,而“看不见的手”也成为古典经济学家坚守的理念。其三,虽然英国思想家同样关注到财政问题,但他们的出发点与中国思想家鲜明不同。重商主义主张“利益交换说”,认为赋税源于臣民需要富强国家的保护,但是国王征税时必须取得议会的同意,且税收应反映人民得自国家的利益,使每个人承受的负担与其从国家享受的利益成正比。在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个人本位更为突出,他们对财政的讨论主要围绕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展开,强调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个人有义务为国家提供赋税,而国家需向个人提供国防、司法与公共工程,与上述职能相关的支出都被认为是必要的,教育与社会救济也因关系人民的生活质量而被思想家所认同。在赋税原则中,公平原则中的“利益说”、“能力说”与“最小牺牲说”均是从纳税人角度出发;效率原则强调征税时要减少给纳税人带来的损失与烦扰。赋税的转嫁理论着重讨论税负在国内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以及对税负实际承担者的影响。而思想家对公债的担忧也往往在于是否会增加个人税负。

六、中英思想家研究本位差异的原因探析

对比两国思想家研究本位的差异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文化依赖的演化路径下两国思想家认知思维上的差异。虽然儒家文化和新教文化都是积极进取的文化,都重视现世的努力,都鼓励积累节约;但在认知上存在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差异,即伦理文化下的中国思想家多表现出明显的整体主义倾向,^①而宗教文化下的英国思想家则主要呈现个体主义倾向,因而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抱负是治国平天下,而新教信徒的人生理想多是追求个人成功。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由来已久,也是自轴心时代之后,中西方经济思想在研究内容上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见图5)。

① 方法论整体主义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古代具有自我加强的特点,而方法论个人主义虽一直存在,但影响较小(钟祥财,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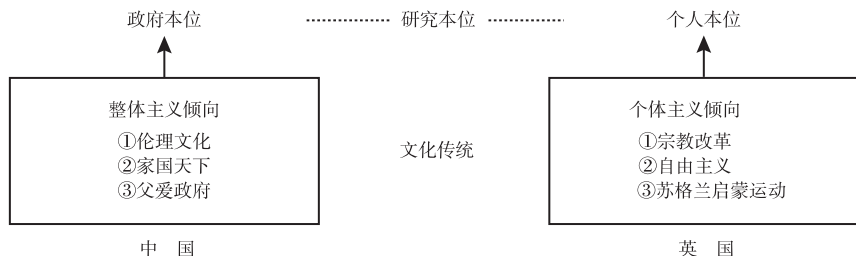


图5 中英思想家研究本位差异的原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整体主义强调社会整体的意义超过其组成部分的加总，个体的行为和功能受到整体的显著影响，因而社会系统的制度和个人在整体中的地位是理解个人行为的起点；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时，优先考虑集体利益，希望以集体的利益来统筹个人的利益，实现对内部利益关系的调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不是孤立的自我，只有通过家族、群体、政府等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儒家的伦理理念和佛教的果报观念及道教的宇宙观、生命理论统筹于儒家思想框架内，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儒家思想以社会性为中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人文教化，以伦理道德教化解决天下的秩序问题，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儒家理念中“家国天下”同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 家和个人成长生活的领域，国是保护家的族群共同体，天下是世界上所有族群生活的地方，有等级性，更有互依性，“家国天下”为文化与命运共同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信念和精神追求，他们将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融为一体，将基于自然血缘之爱升格为对天下的责任意识。同时，在这一宗法社会中，政治与社会是没有分别的，社会与家族也是没有分别的，政治的首领就是家族的首领，其中维系的根本精神全在“亲亲”一念。以此推之，在知识分子心中，“入仕为官”是实现理想抱负的主要途径，而由知识分子主导的“父爱政府”是理想的天下秩序维护者，居于天下体系的核心，是国家繁荣昌盛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必要前提。在这一体系中，政府

^① 孟轲：《孟子》卷7《离娄章句上》，四部丛刊景宋大字本。

和天下人的利益一致，个体利益的实现需以政府对天下秩序的有效管理为前提。因而，明清时期的主流经济思想以政府为研究本位，将希望寄之于家长式的政府，希望以至高的权力协调天下的秩序，借政治之力实现天下和谐。因此整体主义的明清思想家们常常站在执政者角度思考经济问题，意图提供政策建议。

而同时期的英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个体主义倾向，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立平等的个体，整体行为由个体行为所构成，因而个体行为是认识整体的分析起点，应以个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希腊后，可追溯至犬儒主义与斯多葛派，中古后期的教会伦理进一步减少了对商业发展和个人私利的思想束缚。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曾经是中世纪标志的思想统一性，在16世纪开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思考方式的更大的多样性。这一时期的英国经过宗教改革，基督教伦理弱化，新教伦理对人民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因信称义”取消了神职人员与一般信徒间的差别，宗教上的不平等逐渐被破除。同步产生的“天职”观念^①更加推动了人们个性的张扬与对财富的渴望，贫穷有损神的荣光。“因为这乃是个人应当感觉到的一种义务，而且是有义务实际意识到一己‘职业的’活动内容，……此一思想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独树一帜的特征，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正是其本质之所在。”（韦伯，2010：30）人的行为驱动力和自我为中心的动机，使求利具备了宗教上的合法性，这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看来十分重要。承认了个人利益作为一种建设性行为驱动力的作用，同时保留了一种道德判断的原则，使两者得到协调。这与斯密捍卫自发市场，又同时提出“同情的道德原则”的解决方案非常类似。中产阶级凭着自身的进取精神获得了财富，他们厌烦君主的特权，希望追求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地位，这种个人主义很快发展成为自由民主思潮，即使政府也不能因为“父爱主义”来干涉公民的行为、选择与自由。“宗教人”被“经济人”所取代，“当思想的宗教根基枯死之后，功利的倾向不知不觉地潜入称雄”（韦伯，

① 让·加尔文（Jean Calvin）强调，人的生命历程就是响应上帝的召唤的过程，一个人尽天职，就是对神的召唤的回答。神的召唤是选民的标志，为了证明自己是选民，每个信徒都应该有信心和恒心，通过争取和利用上帝给予的每一次获利机会，以世俗事业的成功来荣耀上帝，并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2010: 177)。配第反对宗教迫害和争斗, 提倡宗教宽容, 认为宗教应服从政治生活和世俗权利的要求。人们越来越渴望打破宗教的樊笼, 自由主义思潮兴起, 最显著的特征是个人主义。思想家们提出取代上帝的理性人——人有能力认识并运用社会规律去设计、建立天堂般完美的社会制度(莫贤梁, 2013)。18世纪, 自由思想的功利主义继承人逐渐赞同一种开明的利己伦理学(罗素, 2017: 297—299), 他们提出了人与社会的概念, 承认人性众多不完美之处并对其做出了适度的正面评价。国家权威的正当性和所基于的原则都逐渐被世俗化, 而有关保持社会秩序的宗教观念亦不可避免地被苏格兰启蒙运动所产生的观点淡化。洛克(1982: 127)最早对自由主义哲学进行了详尽论述, 认为人类享有一种“天赋的自由”。1714年,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蜜蜂的寓言》中高度颂扬自利, 指出人性自私不再是恶, 私人劣行经过有技巧的政治家的灵活管理可以变成公共利益(Mandeville, 1806: 5—6)。其后, 苏格兰启蒙运动兴起, 休谟(1997: 559)指出“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 斯密(1998: 229)指出“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是恰当和正确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 善的计算必须依靠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 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有相同分量, 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 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 对幸福的促进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从宗教改革、自由主义到苏格兰启蒙运动都是在努力打破宗教束缚, 追求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 这些文化上的变化都使得英国思想家认为个人才应是分析经济活动理所当然的起点。

七、基于比较视角的经济思想演化系统构建

在依次探究并分析两国思想家的经济思想演进特点与国情因素的复杂互动基础上, 本文由此梳理出社会存在变化对经济思想演进的复杂影响, 进而构建出中英两国经济思想的演进系统(见图6)。

16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 家国天下的情怀使得明清思想家大多持整体主义思维, 从天下治理者的视角考虑经济问题, 在思想上呈现政府本位的特点; 而英国经过宗教改革, 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 思想家多持个人主义思维, 在思想上呈现个人本位的特点。研究本位的不同使得两国思想家的研究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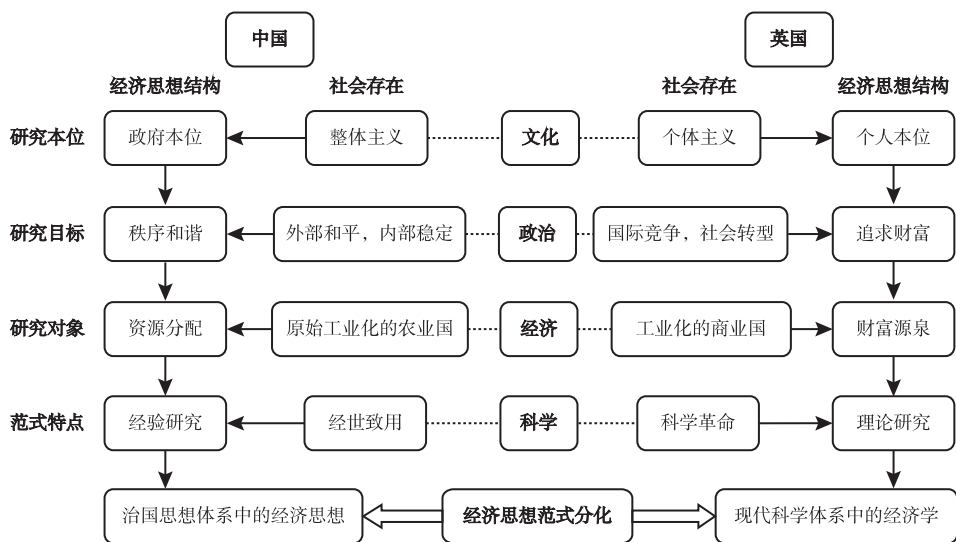


图6 基于比较视角的经济思想演进系统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从一开始就走上不同的方向。外部环境和平、内部政局稳定，使得政府本位的明清思想家主要以秩序和谐为研究目标，而个人本位的英国思想家面对国际竞争与国内社会转型，多以追求财富为研究目标。进一步地，以秩序和谐为目标的中國思想家们，面对基本稳定的经济结构，将研究重点放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而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英国思想家们，在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中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财富的源泉上。在重点关注资源分配、基础科学大体停滞、史志研究盛行的中国，经济思想家们多侧重基于经验的应用研究，注重政策建议；而在发生科学革命的英国，重点关注价值源泉的经济思想家们更加侧重于理论研究，偏重于理性学科框架的构建。同时，在旧有世界观下，中国学术走向经世致用，而世界观的重建带来英国现代科学的兴起和新的学科体系建立；在方法上，中国思想家以文献考据和经验观察为主，英国思想家则综合了演绎和归纳，并辅以实证检验与经验观察，保障了新理论的供给。

由于经济思想发展的文化依赖性，两国经济思想延续了过去的研究本位差异，同时期社会因素的变化也并未使两者趋同。英国面临的持续、急速的社会变革催生了对新经济理论的巨大需求，同时，科学革命带来了基础科学

和研究方法的进步，知识供给的增加为英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此英国经济思想具备了创生现代化“范式”的主要条件；而中国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下，经济问题足以从过往经验或实践中寻求指导，缺乏对新知识的需求，而基础科学的停滞和对实用主义的片面追求也导致理论研究的缺失。最终，英国现代经济科学兴起，而几乎停滞的中国经济思想很快被西方经济科学甩在后面。

总体来看，思想家的研究本位、研究目标、研究对象与范式特点这四个主观方面的特点大致反映了经济思想的演进路径，这些特点与以文化、政治、经济、科学为表征的客观国情因素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经济思想作为主观意识，不仅受到内部因素间的影响，还受到社会存在变化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文化传统影响了思想家的研究本位，思想家的研究本位和国内外政局变迁共同影响了思想家的研究目标，思想家的研究目标和国家的经济结构变迁进一步影响了思想家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和科学发展最终影响了思想家对研究性质的侧重，进而影响到范式特征的形成。研究本位受到文化因素的直接影响，而研究目标则受到来自政治的直接影响与文化通过研究本位的间接影响，同样研究重点受到来自经济结构变迁的直接影响与文化、政治通过研究目标所施加的间接影响，研究范式的演进则受到来自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与文化、政治、经济因素变化通过研究重点所施加的间接影响。

综上所述，同时期的经济思想演进与国情因素变迁共同构成经济思想的演进系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演进是国家现代化进程在经济学家主观意识上的投射，这种经济学家主观意识与社会客观存在在经济学上的统一正可对经济思想现代化谜题作以系统回应。

八、结语

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与演进作为客观国情的主观反映，其进步必然要以国家的全面发展为支撑，所以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时代也必然产生伟大的思想。当前，我国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人类新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党中央

坚持人民至上的宗旨，构建中国式民主；在经济上，我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经济业态等方面步入世界前列；在科技上，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2017：73）在此背景下，学者更要充分依托我国国情，遵循经济思想演化的一般规律，大力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实现中国经济学的转型突破和发展超越。

参考文献：

- 陈独秀，1987，《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载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 陈立，1944，《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科学与技术》第4期。
- 程霖、张申、陈旭东，2020，《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一个历史考察》，《经济研究》第9期。
- 达维南特，查尔斯，1995，《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朱泱、胡企林译，商务印书馆。
- 杜恂诚，2011，《“大分流”的文化成因说评析》，《社会科学》第11期。
- 葛剑雄，2002，《中国人口史》第1卷《导论、先秦至南北朝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 宫崎犀一、奥村茂次、森田桐郎编，1990，《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6世纪以来）》，陈小洪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顾炎武，1983，《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中华书局。
- 顾炎武，1998，《顾亭林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 Holton, G., 1983,《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上），张大卫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 胡寄窗，1981，《从世界范围考察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经济问题探索》第4期。
- 胡寄窗，1986，《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月刊》第3期。
- 胡适，1999，《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读书与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黄少安，2000，《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考》，《经济研究》第5期。
- 黄宗智，1993，《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
- 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2002，《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载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
- 库恩，托马斯，2003，《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伯重, 2001, 《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研究》第1期。
- 李大钊, 1920,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新青年》第2期。
- 李大钊, 1984,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 载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 梁启超, 2001,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集, 云南教育出版社。
- 梁启超, 2015,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崇文书局。
- 林文勋、张锦鹏, 2019, 《“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明清“市民社会”说再探讨》, 《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
- 林毅夫, 2007, 《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刘含若, 1980,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 《求是学刊》第4期。
- 罗素, 伯特兰, 2017, 《哲学简史》, 伯庸译, 台海出版社。
- 洛克, 1982, 《政府论》(上), 瞿菊农、叶启芳译, 商务印书馆。
- 马涛、李卫, 2019, 《中西方传统经济思想特点的比较》, 《学术月刊》第2期。
- 马寅初, 1936, 《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序》, 载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 商务印书馆。
- 孟, 托马斯, 2011, 《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 袁南宇译, 商务印书馆。
- 莫贤梁, 2013, 《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从化恶为善到化私为公的自发秩序》, 《理论界》第3期。
- 穆勒, 约翰, 1991, 《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 胡企林、朱泱译, 商务印书馆。
- 钱乘旦、许洁明, 2002, 《英国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石世奇, 2005,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研究 石世奇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斯密, 亚当, 1998, 《道德情操论》, 蒋自强译, 商务印书馆。
- 斯密, 亚当, 2014a, 《亚当·斯密全集》第2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 郭大力、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 斯密, 亚当, 2014b, 《亚当·斯密全集》第2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 郭大力、王亚南译, 商务印书馆。
- 宋应星, 1988, 《宋应星学术著作四种》, 江西人民出版社。
- 宋应星, 2002, 《天工开物》, 岳麓书社。
- 谈敏, 1990, 《重农学派经济学说的中国渊源》, 《经济研究》第6期。
- 谈敏, 2008, 《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 唐君毅, 2016, 《中国科学与宗教不发达之古代历史的原因》, 载《唐君毅全集》第27卷

《中国古代哲学精神》，九州出版社。

唐任伍，1999，《“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王夫之，2011a，《船山全书》第10册，岳麓书社。

王夫之，2011b，《船山全书》第11册，岳麓书社。

王捷，2007，《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系统的经济学——兼论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猜想》，《经济与社会发展》第11期。

王守仁，2015，《王文成公全书》，中华书局。

王亚南，1948，《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历史的经济的解释）之十二》，《时与文》第19期。

王章辉，2013，《英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韦伯，马克斯，20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承明，1983，《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第1期。

吴国盛，2016，《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16，《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8日），《人民日报》7月9日。

习近平，2017，《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习近平，202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夏锦乾，1998，《从求实到求真——试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起点》，《学术月刊》第9期。

熊金武，2015，《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变迁的一个框架》，《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

休谟，大卫，1984a，《论货币》，载《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

休谟，大卫，1984b，《论利息》，载《休谟经济论文选》，陈玮译，商务印书馆。

休谟，大卫，1997，《人性论》，贺江译，商务印书馆。

徐光启，1963，《徐光启集》，中华书局。

严清华，1991，《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日本的影响》，《经济评论》第1期。

杨春学，2016，《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问题》，《经济研究》第8期。

叶世昌，2005，《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叶坦，1999，《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张海英，2017，《明清时期“商书现象”之分析》，《明清论丛》第1期。

- 张中、张亚光, 2017, 《中西经济思想的首次“大分流”——基于罗马与秦汉时期的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经济科学》第1期。
- 赵靖主编, 2002,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4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赵晓雷, 2005, 《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 《经济学家》第3期。
- 钟祥财, 2006, 《2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述论》, 东方出版中心。
- 钟祥财, 2013, 《从养民论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方法论形成及近代特点》, 《贵州社会科学》第10期。
- 周文, 202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若干探讨》,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3期。
- Beier, A. L. 1983.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London/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 Cole, W. A. 1981. “Factors in Demand 1700 – 80.”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 Vol. 1: 1700 – 1860*, edited by Roderick Floud, and Donald McCloskey, pp. 36 – 65. Cambridge/New York/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 Jichuang. 2009. *A Concis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Hutchison, Terence. 1988.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 – 177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Mandeville, B. 1806.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 London: T. Ostell, Ave-Maria Lane.
- Mathias, Peter, and John A. Davis (eds.). 1989.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Mitchell, B. R. 1988.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B. R., and Phyllis Deane. 1962.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London/New York/Ibad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eedham, Joseph, and Dorothy Needham. 1954. *Science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 Science Outpost*. London: The Pilot Press Ltd.
- Petty, William. 1662.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N. Booke.
- Potter, Roy. 1982.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Tawney, R. H. 1978. “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 – 1640, and Postscript (1941 and 1954).” In *History and Society: Essays by R. H. Tawney*, edited by J. M. Winter, pp. 85 – 12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Wordie, J. R. 1983. “The Chronology of English Enclosure, 1500 – 1914.”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6 (4) : 483 – 505.

A Re-explo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uzzl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i W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Why did Chinese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which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ancient times, lag behind Britain in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perplexing Chinese scholars for a long tim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rough the deconstruction of objective social existence and economic though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dernization of this economic thought so that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cusing on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mid – 19th century,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s the subjective factors represented by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thought of Chinese and British scholars and the objective factors represented by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structs the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same period constitute the evolution system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modernization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is the projection of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on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economists. The unity of economist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objective existence in economics can make a systematic response to the “Needham Puzzle”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Keywords: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Characteristic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JEL Classification: A12, A32, B11, B41

(责任编辑: 倪诗妆)